



沈从文^下精读

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长河》：“常”与“变”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文物研究：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张新颖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58919

I206.6
210
V2



沈从文^下精读

张新颖 著



I206.6
210
V2



北航

C1746160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1082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精读 / 张新颖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78-4155-9

I. ①沈… II. ①张… III. ①沈从文 (1902~1988)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0989号

书 名: 沈从文精读

著 者: 张新颖

责任编辑: 谢 放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字 数: 457千字

印 张: 36.7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155-9

定 价: 68.00元 (上下册)

出版说明

本书 2005 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首版。此次出版，考虑广大读者的阅读要求，我社精选沈从文先生代表作品附录其后。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沈龙朱、沈虎维两位先生的支持和帮助，特此鸣谢！

为保持沈从文先生作品的原貌和风格，只要不是明显错漏，本书一律不作改动。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呾语狂言

“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说法适用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转折的人，包括与沈从文同代的很多作家。历史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裂变，个人的命运和事业，大多数只能随着这个巨大的、根本性裂变而发生重要的调整，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向。

但是，即使很多人都处在分水岭上，沈从文仍然显得非常特殊。他是以精神的极端痛苦和紧张而孤立在分水岭上的，其孤立的程度，在他觉得是唯一的一个；其极端的程度，竟至于发展到“精神失常”和自杀。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他的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处在崩溃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崩溃了。

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关于一九四九年的情况有扼要说

明：“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九月中下旬，病情渐趋缓和。作《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和午夜》长诗反映这个过程，以及音乐对于自己的特殊作用。但精神上的康复还待漫长岁月，且时有反复。”^①《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在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中说，“至秋冬，病情渐趋平稳”。^②

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各种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19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27卷；（三）三首长诗，除上文提到的两首，还有作于五月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编入第15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我们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我们来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

^① 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40页。

^② 新编集《一个人的自白》的编者说明，《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我们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这个“恢复”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个“恢复”，不但沈从文后半生的事业无从谈起，而且也将使得沈从文的精神痛苦和思想坚持失去可以证实的意义。

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我们先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①“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②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

^① 沈从文：《题〈绿魇〉文旁》，《沈从文全集》第1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② 沈从文：《复张兆和》（19490129），《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中一段是这样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①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在一九四八年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

^① 《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10页。

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①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②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③

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

① 沈从文：《致季陆》（19481201），《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② 沈从文：《致吉六》（19481207），《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19页。

③ 《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①

“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渝’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② 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③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④，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

① 沈从文：《复张兆和》（194902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17页。

② 沈从文：《致张以瑛》（19490313），《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19—20页。

③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 张兆和：《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锠等》（194904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他计划自己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烈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人为人毁灭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隔院留声机放出哭泣声，而旁边放送者却发出笑语，“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①

沈从文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章，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这种对比实在

^① 沈从文：《四月六日》（19490406），《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25页、28页、29页。

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其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的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一九三三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从七月连载至十二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的文艺官员和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照片发呆”。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

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的时候，在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沈从文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我们据此来看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三三也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又是现实中他对妻子的称呼。从虚构回到现实，“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①

“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

^①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43页。

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①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丁玲在六月份曾经和何其芳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这句话，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他写这封信，向丁玲提出了一个实际要求。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

^① 沈从文：《致刘子衡》（194907左右），《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